

洋浦西部陆海新通道 国际航运枢纽建设思考

□ 苏金明 夏勇开

在举全省之力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奋力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洋浦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港功能势在必行。新形势下,发挥优势,抢抓机遇,整合资源,增强国际中转业务功能,加快建设数字化的国际中转集拼枢纽,是洋浦与时俱进,进一步提升自身影响力、辐射力的重要路径。

H发展建言

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需要。如何促进两地城市功能互补、产业协同发展,确保儋州洋浦一体化开好局、起好步,成为今年省两会的热议话题。2021年,儋州和洋浦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达831.91亿元,比上年增长19.8%,超过全省11.2%的平均水平,已成为我省新的重要增长极,尤其是洋浦,生产总值达到436.59亿元,同比增长34.2%。“儋洋”增长极的提出,将加快洋浦与儋州“港产城”一体化融合步伐,加速要素聚集,带动腹地经济发展,对建设洋浦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具有积极作用。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建设‘中国洋浦港’船籍港”。2019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实施以来,洋浦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航指标显著提升,航运要素初步聚集,区域国际航运枢纽的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步增强。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提出要进一步强化重要枢纽功能,打造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着力提升洋浦港集装箱码头和航道等级能力,加快完善集疏运体系,增强洋浦港国际中转业务功能。

洋浦已具备国际中转枢纽港重要节点功能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的“虹吸效应”吸引高端港航产业迅速向洋浦集聚,港航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水路运输、船舶服务、海员服务等传统业态稳步增长,保税油加注、航运金融、航运保险、航运电商、船舶融资租赁等新业态纷纷呈现。其中,不乏中远海运集团和招商局集团等航运巨头落地洋浦。

截至2021年底,洋浦已建成港口泊位47个,通过能力1.1亿吨,“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国际航行船舶总数增至30艘。2021年,洋浦港集装箱吞吐量131.83万标箱,同比增长29.3%;水路货物周转量7208.62亿吨公里,同比增长230.1%,增速全国第一。预计到2025年,洋浦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到650万标箱。

目前,洋浦已具备多通道资源整合的制度环境和国际中转枢纽港重要节点功能。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

需进一步强化与广西北部湾、广东湛江和重庆等港口的协同联动,深化与粤港澳、长三角和京津冀的合作;同时强化不同方向出境出海通道的有效衔接,推进数字化的国际中转集拼枢纽功能建设,真正成为国内外国际双循环的交换节点。

建设数字化的国际中转集拼枢纽

国际航运枢纽不只是一个吞吐量的概念,还必须有中转箱量的指标,其中国际中转集拼是重要指标。国际中转集拼是指境外货物经过近洋、远洋国际航线运至中转枢纽港,与内地通过沿海、沿江内支线船舶转至中转港的出口货物,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拆箱进行分拣和包装,并根据不同的港,与本地货源一起重新装箱后再运送出境的一种物流业务。相比香港、新加坡,洋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集装箱枢纽港,货源腹地辽阔,开展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可以大幅节省时间和成本,吸引更多国际采购、分拨配送等高附加值物流增值服务。海关总署2018年第120号公告《关于海运进出境中转集拼货物海关监管事项的公告》实施以来,全国各主要口岸在中转集拼业务上积极探索,但均遇到不少跨关区中转难题。海南全岛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将使洋浦突破跨关区中转难题,其发展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具备国内其他港口不可比拟的特殊优势。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实施以来,通道沿线相关省份围绕打通主通路、外贸集装箱中转、重点枢纽堵点和瓶颈等,从扩大通道能力、强化枢纽功能、增强运营组织水平和协同联动、着力优服务、降成本和推动高水平开放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系统的任务安排,但同时在利用效率、运营成本和可持续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处理的快速发展,为物流推算提供了极

好的计算工具,准确、快速的航运及车流推算需要积极采用大数据处理信息技术。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有必要在洋浦推进数字化的国际中转集拼枢纽功能建设,充分利用通道历史数据,进行关联、挖掘与分析,建立一个推算精度更高、运算速度更快、规模扩充更灵活的物流推算环境,实现统一的货运营理与决策,促进资源联动和共享。通过优化物流网络结构,提升集货效率,拓展国际数据业务功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运行提供有效的综合解决方案。

发展建议

加快完善港口基础设施和相关政策配套,建设国际中转集拼服务中心。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港口的业务深度融合,拓展港口供应链上下游各环节与领域,提升港口信息服务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港口快速装卸、编组以及集拼、集结效能。加强海运与铁路、公路、空运等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推动建立船、车、班列、港口、场站、货场等信息资源开放与共享机制。加快跨关区中转制度集成创新,协同海关发布国际中转集拼便利化制度,为进口分拨与国际中转、出口集拼货物提供便利化监管运营环境。点对点招商全球核心国际中转集拼企业落户洋浦,开展国际拼箱、多国混拼等不同拼箱业务。扩大以洋浦港为离境港的启运港退税政策适用范围,目前以洋浦港为离境港的启运港只有广州南沙港等15个,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重庆,以及上海、宁波、深圳等沿海重要港口还未纳入,建议协同海关进一步申请扩大。

加快跨境数据流通制度集成创新,以数字化赋能国际中转集拼枢纽建设。积极会同海关等监管部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实现与新通道沿线省份铁路部门、海关、检验检疫机构等信息系统

电子数据库的交换与共享,形成物流信息链,

推行海关、港口、铁路、检验检疫单据电子化,最终打造数字化通道。拓展国际数据业务功能,加快跨境数据流通制度集成创新,探索设立离岸数据中心,带动发展数字贸易、国际金融、离岸数据服务外包、互联网创新孵化等关联业态;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探索特定领域数据非本地化存储;培育一批以“在线、智能、交互”为特征的龙头企业,发展高端化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字挖掘等数据增值服务。

加快洋浦与儋州“港产城”一体化融合,带动腹地经济发展。拓展儋州洋浦综合发展空间,合理优化空间布局,营造“大港、大区、大城”的发展态势,形成国际化、规模化、一体化、系统化的港产城良性发展格局。加速环新英湾白马井、王五、中和、新州、木棠等乡镇与洋浦的一体化管理,统一产业布局,推进相关产业聚集,同时加强与海口等中心城市的联动发展,拓展洋浦腹地经济规模,形成空间布局合理、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完善顶层设计及多边协调机制,加快境外货源开发。通过顶层设计,协调各方面关系,强化海运、铁路、海关、国检及物流服务商的协作,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推动全程运网设计,推进国内各省区市以及相关国家海关检验检疫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鼓励相关物流企业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主要城市共建物流中心,为欧洲、中亚与东南亚、南亚等地区间的转口贸易提供航运便利,组织挖掘货源。统筹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等运输组织方式与中欧班列高效衔接,开通洋浦经钦州、成都到欧洲的免检品电商邮货运,建设中欧班列重要衔接点,打通海南与欧洲及中亚的快捷通道。

(作者苏金明系海南省工程咨询设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夏勇开系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海洋所所长、海南中船蓝泰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从国家政策演进观数字经济精细化发展

□ 盘和林

数字经济政策发展历程

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政策发展历程,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初步基础设施搭建阶段。这一阶段可以追溯到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和2001年关于促进我国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若干意见的通知。该阶段主要在于搭建信息基础设施体系,为进一步的通信技术发展以及衍生的产业转型夯实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探索“互联网+”的发展阶段。在信息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过程中,通信技术的不断演进带来了通讯设备成本的降低和通信服务获得的便捷,这一阶段的突出表现是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文件包括2002年的《关于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的通知》和2005年的《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互联网+”产业布局政策,包括2015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

第三个阶段则是真正形成数字经济的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起步源于2015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其中首次提出中国将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均关注到了传统领域与互联网的融合,这一阶段不仅仅是传统的“互联网+”,而是在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互联网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催化剂工具,而逐步变成真正的反应剂。这一阶段的国家政策包括2016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科学的数字经济促进政策体系。比如,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进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

数字经济迎来精细化发展

在政策演进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定义不断丰富和具体化。此次出台的《规划》对该定义进行了综合提炼,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数字经济概念。

《规划》将数字经济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同的时代价值位置,明确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该定义预示着数字经济旨在从全要素生产力的角度来推动整体经济发展,且在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在国家层面的指标引领下,数字经济将迎来新一轮的精细化发展。具体而言包括:

在顶层设计之下,地方数字经济规划的差异化设计。《规划》将数字经济放在了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指出数字经济是未来一个时代的代表。在农业和工业领域,我国各省份、各地市、各区县均能找到自身的差异化竞争点,在数字经济领域也同

样。在国家规划的推动下,各地会陆续出台符合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充分依托自身的客观条件进行科学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促进形成多点开花、连点成片的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格局。

综上,笔者以为,我国数字经济的政策和规划体系已经从最开始的摸索逐步转变为有条理、有逻辑、有针对性的科学布局,未来,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下,数字经济将迎来精细化发展时代,从差异化布局到区域协调再到重点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公共服务的对口帮扶,一个更多元、更完善、更有竞争力的数字经济正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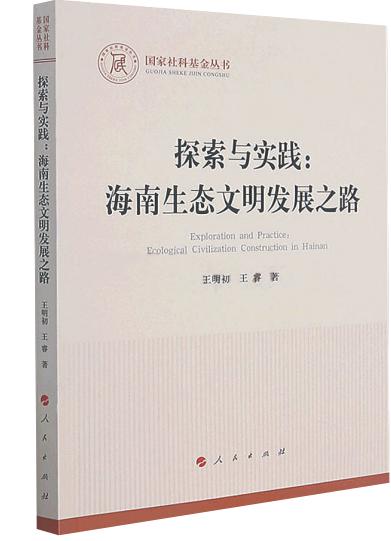
(作者系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H热点聚焦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作出了系统部署,其中明确“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下,数字经济内涵和定义日渐丰富和具体化,逐步迎来精细化发展时代。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为构建“数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H书里书外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明初教授、王睿副教授的研究成果《探索与实践:海南生态文明发展之路》2021年8月被人民出版社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丛书”出版发行。该学术专著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南国际旅游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发展战略研究”的结题成果,是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到开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

该学术专著共六章加一个导论,贯穿一根红线,即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通过正确选择并不懈坚持“生态立省”,深入探索海南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为在自由贸易港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提供鲜活经验。该书导论简要地介绍研究项目的由来,以及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历史积淀和当下责任担当。六章的内容为:从“生态省”建设到“海南国际旅游岛”国家战略开启;“绿色崛起”是海南建设发展的主题词;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空间布局和评价体系;海南“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发展路线图与生态风险防范;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总结及政策建议;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地域性不同范式。该书的理论创新集中在对实践成果的提炼,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能跨越工业化阶段,但海南省作为一个非独立的小经济体,可以借助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整体性力量,从自身优势出发参与社会分工,步入以至超越工业文明时代;海南的建设发展要突出“绿色崛起”主题词,坚持“生态文明主导”,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与发展民生和生态扶贫紧密结合;构建绿色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政府绿色治理能力,确保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性、持续性、多样性发展。

该学术专著的主要特点:一是立意高远。该书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认为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将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是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应担当起引导者的重任,而海南的生态文明实践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二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实践,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而且,按照海南岛功能区域划分和各市县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多样性的统一。三是史论结合。该书中的结论和基本观点来自实践,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战略思路的发展变化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四是逻辑严密。该书按历史的逻辑顺序,系统研究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发展轨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勾勒了海南从建设“生态省”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转换,进而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的奋进历程。

王明初教授的学术研究是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起步的。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折射出从“三农”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王明初教授对海南生态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农”、对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对海南生态建设的缩影。三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实践,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而且,按照海南岛功能区域划分和各市县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四是史论结合。该书中的结论和基本观点来自实践,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战略思路的发展变化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四是逻辑严密。该书按历史的逻辑顺序,系统研究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发展轨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勾勒了海南从建设“生态省”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转换,进而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的奋进历程。

王明初教授的学术研究是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起步的。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折射出从“三农”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王明初教授对海南生态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农”、对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对海南生态建设的缩影。三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实践,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而且,按照海南岛功能区域划分和各市县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四是史论结合。该书中的结论和基本观点来自实践,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战略思路的发展变化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四是逻辑严密。该书按历史的逻辑顺序,系统研究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发展轨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勾勒了海南从建设“生态省”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转换,进而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的奋进历程。

王明初教授的学术研究是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起步的。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折射出从“三农”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王明初教授对海南生态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农”、对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对海南生态建设的缩影。三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实践,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而且,按照海南岛功能区域划分和各市县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四是史论结合。该书中的结论和基本观点来自实践,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战略思路的发展变化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四是逻辑严密。该书按历史的逻辑顺序,系统研究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发展轨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勾勒了海南从建设“生态省”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转换,进而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的奋进历程。

王明初教授的学术研究是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起步的。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折射出从“三农”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王明初教授对海南生态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农”、对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对海南生态建设的缩影。三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实践,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而且,按照海南岛功能区域划分和各市县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四是史论结合。该书中的结论和基本观点来自实践,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战略思路的发展变化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四是逻辑严密。该书按历史的逻辑顺序,系统研究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发展轨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勾勒了海南从建设“生态省”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转换,进而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的奋进历程。

王明初教授的学术研究是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起步的。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折射出从“三农”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王明初教授对海南生态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农”、对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对海南生态建设的缩影。三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实践,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而且,按照海南岛功能区域划分和各市县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四是史论结合。该书中的结论和基本观点来自实践,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战略思路的发展变化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四是逻辑严密。该书按历史的逻辑顺序,系统研究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发展轨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勾勒了海南从建设“生态省”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转换,进而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的奋进历程。

王明初教授的学术研究是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起步的。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折射出从“三农”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王明初教授对海南生态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农”、对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对海南生态建设的缩影。三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实践,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而且,按照海南岛功能区域划分和各市县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四是史论结合。该书中的结论和基本观点来自实践,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战略思路的发展变化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四是逻辑严密。该书按历史的逻辑顺序,系统研究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发展轨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勾勒了海南从建设“生态省”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转换,进而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的奋进历程。

王明初教授的学术研究是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起步的。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折射出从“三农”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王明初教授对海南生态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农”、对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对海南生态建设的缩影。三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实践,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而且,按照海南岛功能区域划分和各市县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四是史论结合。该书中的结论和基本观点来自实践,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战略思路的发展变化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四是逻辑严密。该书按历史的逻辑顺序,系统研究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发展轨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勾勒了海南从建设“生态省”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转换,进而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的奋进历程。

王明初教授的学术研究是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起步的。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折射出从“三农”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王明初教授对海南生态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农”、对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对海南生态建设的缩影。三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的生态文明实践,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而且,按照海南岛功能区域划分和各市县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了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多样性的统一。四是史论结合。该书中的结论和基本观点来自实践,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战略思路的发展变化及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四是逻辑严密。该书按历史的逻辑顺序,系统研究了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发展轨迹,按照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地勾勒了海南从建设“生态省”到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转换,进而担当“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新使命的奋进历程。

王明初教授的学术研究是从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起步的。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折射出从“三农”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王明初教授对海南生态文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三农”、对自然的一种人文关怀,更是对海南生态建设的缩影。三是内容丰富。该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在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海南建省办经济